

社区工作教学与实务模式本土化路径探讨

罗彩娟 李红武

摘要:社区工作教学和实务存在与本土环境不相符合的地方,主要体现在社区工作教材大多援引西方的社区工作实务模式内容,致使在教学和实务工作脱节。要推进社区工作实务模式的本土化,首先从我国社区独特内涵出发,挖掘社区的本质特征,以便找到符合我国社区特点的实务模式;其次梳理我国在乡村建设运动、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从中总结提炼适合我国本土环境的实务模式。在本土化社区工作教学实践尝试中,把学生分成若干组,分别进入社区,然后按照“确定社区体验对象、开展社区调查分析、进行社区活动策划实施、提出社区发展建议和社区实践总结”五个步骤开展工作,将有利于实现社区工作教学与实务模式的本土化。

关键词:社区工作 教学 实务 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828(2014)01-0046-07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4.01.007

罗彩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广东广州 510275);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广西南宁 530001);李红武,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102)。

作为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之一,社区工作的发展相对较晚,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逐渐受到学界的认可,而且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也并不顺利,有学者指出,在近代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工作者对个案及小组工作的热衷导致在实践领域中重视对个人辅导及治疗模式的应用,而这种治疗化趋势让人们“逐渐遗忘了或忽略了社区工作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重要性”(甘炳光,2011)^①。相比西方而言,我国真正意义上社区工作的引入更加晚近,学界也极力将西方国家社区工作的三大模式引入社区实践,但我国社区实务概念的含义比较具体且狭义,主要指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其范围局限于直接、具体的服务活动与服务设施,间接的行政管理、组织动员、社区规划、社区发展和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没有纳入社区实务范畴,社区服务的模式常常等同于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范围远远小于英美国家。

^①资料来源:甘炳光,“社区工作:意义重塑与展望”,2011年3月林护社会工作讲座发言稿。

笔者在多年的社区工作教学实践中发现,之所以造成社区工作教学与实务本土化的困境,主要基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社区工作本土专业教材的缺乏;二是社区工作实务本土化模式探索不足;三是社区工作教学与实务存在脱节。鉴于此,本文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和反思,试图探讨社区工作教学与实务模式的本土化问题。

一、反思:现有社区工作专业教材评述

社区工作教学和实务模式要实现本土化目标,最重要的一个参照就是教材的编写内容是否符合本土文化,是否适应本土环境。目前已出版的社区工作教材中,其内容大多借用西方的社区工作模式来加以介绍,而对本国的具体社会文化背景则考虑较少。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组编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系列教材之一,由徐永祥(2004)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社区工作》。该书对社区和社区工作的概念定义做了介绍,社区工作分别在西方和中国的发展历程,社区工作的价值观、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础等相关内容之后,对社区工作的几大实务模式进行阐述,分别是地区发展模式、社会策划模式、社会行动和社区照顾。其他章节有社区工作者、社区工作方法技巧、社区工作政策及政策分析、社区工作前瞻与发展趋势等。

房列曙,陈恩虎,柴文杰(2005)主编,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区工作》,主要介绍社区工作的相关概念、历史发展、理论界定、社区工作的基本手法、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社区工作模式、中国的社区服务、社区工作的一般过程与方法、社区工作技巧、新时期对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及素质要求等内容。西方的社区工作模式即地区发展、社会策划、社会行动。另外介绍了中国的社区工作实践,如社区服务,以及社区教育、社区组织等内容。

刘梦(2007)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社区工作》,在理论篇中,从第二章到第七章,分别介绍了地区发展模式、社会行动、社会策划、社区组织、社区教育、社区照顾等社区工作实务模式。

夏建中(2009)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区工作》,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该书较详细地介绍了社区发展、社会策划、社会行动、社区照顾、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矫正、社区组织以及社区工作的过程与方法。

钟利民(2010)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区工作》,除了介绍社区发展模式、社会策划模式、社会行动模式之外,另外介绍了社区教育与社区照顾模式。

这些教材在社区工作的相关理论和实务模式的介绍和推广方面做出了极有意义的贡献,对西方社区工作的三大工作模式——地区发展模式、社会策划模式和社会行动模式达成了共识。此外,这些教材介绍了社区照顾、社区组织、社区教育、社区矫正等社区工作实务模式。姑且不论这些社区实务模式是否得到广泛的认同,就各自的介绍而言,这些模式是否适应中国的现实情境、如何将实务模式与我国具体的社会文化相结合等内容,鲜有涉及。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在社区工作模式认知上的模棱两可,而且反映出社区工作实务模式本土化之路还很长。

因而,从教材上而言,如何编写出符合我们本土文化的社区工作教材迫在眉睫。

二、路径:本土化社区工作实务模式探索

关于社区工作实务模式,被广泛应用的西方三大社区工作模式分别是地区发展模式、社会策划和社会行动。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这三大实务模式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本土情况。如社会行动模式发端于美国本土,其能不能适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结构都不相同的中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徐永祥,2004)。社会行动模式,首先要求社区工作者要觉察到居民对某些问题的特别关切,利用这些问题去发动居民,组织起来或采取一致行动,主要方法为:讨论、公开辩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呼吁去引起社会各界和政府当局的关注与同情,也采取请愿、游说、游行示威、静坐等行动,以求问题的公正解决。然而这种极端的方法,常常被认为是破坏了安定繁荣的局面。有些人认为,社会行动会导致社会动荡,破坏社会的繁荣及稳定。这对于当今强调和谐稳定的中国而言,显然也不合时宜。

那么,如何实现社区工作模式的本土化?笔者认为,要推进社区工作实务模式的本土化,可通过以下两条途径努力:

(一)从我国社区独特内涵出发,挖掘社区的本质特征,找到符合社区特点的实务模式

社区这个术语是舶来品,最早是由德国社会思想家滕尼斯提出来的,1887年他出版了Community and Society(共同体与社会,又翻译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一书。费孝通于1933年把“community”翻译为“社区”。

滕尼斯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农村为代表的礼俗社会,一种是与城市为代表的法理社会。在滕尼斯的眼中,“社区”是传统乡村地域的代表,它是由同质人口组成、关系密切、疾病相抚、守望相助并且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团体。乡村“社区”里的社会关系是紧密合作的,人们比较注重集团整体的利益,而城市的社会关系则是独立的,非人情化的。“社区”和“社会”是不同的两种社会类型。他认为,社会变迁的总趋势是从乡村“社区”这一由自然形成的社会团体,逐渐向由分工和契约联系起来的,异质人口组成的城市“社会”的转变。由此可见,滕尼斯所使用的“社区”一词的含义明显区别于人们现在对“社区”的解释。(刘君德、靳润成、张俊芳,2004)

每个学科对社区的定义都不同,地理学强调社区的空间定义,经济学强调社区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社会学强调社区的社会交往功能和人际关系与网络。即使在同一学科中,对社区的定义也存在很大的争论。大约五十年前,希勒里在社会科学文献中找出了94种关于社区的不同定义,所有这些定义中都包括空间、人口和社会交往等基本要素。

徐永祥(2004)认为,所谓的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是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张敦福(2011)在《现代社会学教程》中引叙了一些学者关于社区的定义,其综述社区的几个基本要素也能表明社区是什么,这些基本要素是:共同情感联系和价值的认同,共同的地域空间,共同的利益,一定的人群。徐震(2007)在对相关社区定义梳理的基础上,将社区界定为居住于某一个地理区域,具有共同关系、社会互动及服务体系的一个人群。简言之,社区是一个人群,他们住于相当接近的地区,彼此常有来往;具有若干共同的利益,彼此需要支援;具有若干的服务,如交通、学校、市场等;面临若干共同的问题,如经济的、社会的、教育的等;产生若干共同的需要,如生活的、心理的、社会的

等。由于这种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问题、共同的需要,遂产生一种共同的社区意识,即社区归属感。为了达成其共同的目标,社区必须组织起来,互助合作,采取集体行动,以共同发展。具备这些或其中的一些条件或其潜能的一个群体,即可称之为一个社区。

其实,要根据具体的背景来理解社区,比如在我国大陆和香港,和西方社会所理解的社区很不一样。这么多的社区定义只是表明了人们对社区的理解是多元的,并不存在绝对正确的或者公认的社区概念。

那么,我国的社区内涵,和西方有何不同?中国对于“社区”这一概念的理解一般采用两种标准来划分:一种是以社区的性质为标准,划分出了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另一种是以社区的形成方式为标准,划分出了自然性社区和法定性社区。其中,自然性社区是自然形成的,比如自然村;而法定性社区则是人为规定的。

2001年民政部把调整后的居委会称为城市意义上的社区。民政部原部长李宝库说:“中央文件已明确,一般是把经过了规模调整的社区体制改革的居民委员会辖区来作为城市社区的范围……社区划分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地缘型,以主要街巷、道路为界,一块一块比较完整;另一种是单元型,一个封闭的小区,就是开发商开发的,很完整;第三种是单位型,一个单位所形成的社区。”(李宝库,2001)中国大陆城市街道社区具有三个特点:1.它是法定性社区。2.它是城市的基层社区。3.它是一种局部性社区(孙莹,2006)。

可见,我国的社区内涵与西方的是不同的,如何根据我国的社区内涵,寻找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社区工作实务模式是当务之急。

(二)梳理我国在乡村建设运动、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从中总结提炼适合我国本土环境的实务模式

与西方社会不同,我们具有自身独特的社区工作经验,虽然这些社区工作经验并不是专业意义的社区工作,但是这些“社区工作”实务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在引进西方社区工作模式的同时,要注意借鉴自身的经验。

1.乡村建设运动

中国经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处于崩溃的边缘,其中,农村的经济社会矛盾尤其突出。为了拯救破败的农村,许多由知识分子揭开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序幕。这次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改造乡村,改造中国”,并以此达到“民族自救”或“民族再造”的目的。

首先是晏阳初提出并付诸实践的,以“定县实验”为开端的“华北平民教育运动”。1926年,一批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的有志之士随同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今定州市)进行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试验,意在顺“民心”、发“民力”。晏阳初认为,“教育”才是乡村建设的核心,必须通过教育来推进乡村建设。

其次是梁漱溟以文化复兴为核心的“邹平实验”,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中国新社会组织的萌芽一定要生长于乡村,从乡村入手求组织特别适合于理性的发挥。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省中北部的邹平县,创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同时创办《乡村建设》半月刊,积极投入到乡村建设实验之中。

第三是卢作孚的“北碚实验”,与前两者有所不同的是,卢作孚是从经济建设的角度入手的。1927年,卢作孚开始了建设实验,实验中心在四川巴县北碚乡。他始终坚信,事业的建设才是乡村最缺少的,农民最需要的是谋“民生”、保“民享”的乡建计划。

最后,陶行知践行的以生活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晓庄实验”。陶行知认为改革中国的教育是改造落后中国的前提,而“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陶行知在1927年辞去工作来到南京,在城外创立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更为晓庄学校)。“晓庄实验”由此而来。

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乡村建设运动规模庞大,气势磅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六百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试)验区有一千多处。而且这些团体和机构非常复杂,包括社会团体,政府机关,教育机关等。然而,费孝通发现,当时的情况是,有轰轰烈烈的“乡村运动”(邹平、定县),却没有来自农村的关于农民态度的忠实报告。他认为,改变农村先要了解农村,这样才能预测乡村运动的未来。由此,费先生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农民的态度如何?他们怎样看待这些下乡来的知识分子以及引入的新的生活方式?(李友梅,2005)正因为没有解决费孝通提出的这些问题,这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失败,但是这场乡村建设运动还是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不少国家在社区发展中注意借鉴中国乡村建设实验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晏阳初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多次被邀请到一些发展中国家介绍中国的乡村建设经验,并从事具体的指导工作。他本人曾任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院长,为世界社区发展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国际贫民教育之父”。

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区工作,但其所倡导的深入农村社区进行社区组织和建设工作,帮助农民解决贫穷等问题,已经起到了社区工作的作用。此外,他们的理想是志在强国,通过改造农村来拯救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社区工作的助人目标,更具有借鉴意义(房列曙、陈恩虎、柴文杰,2005)。

2.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社区服务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迅速展开,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的和产业的高速成长变化极大地冲击着20世纪80年代之前较为稳定和封闭的城乡社区。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随之引发社会结构的巨变,如出现人口老龄化趋势、家庭的小型化与自我服务功能的弱化。同时,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很多生活服务设施不健全,需要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1989年12月26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社区服务”的概念第一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固定下来。自此,“社区服务”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项行政职能,以满足居民需求为重点的社区服务在全国迅速推进。到了1989年底,全国开展了社区服务工作的城市街道数量已达3267个,是当年街道总数的66.9%(刘君德、靳润成、张俊芳,2004)。

1993年,由民政部等14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给社区服务这一概念下了正式的定义:社区服务是在政府倡导下,为满足社会成员多种需求,以街道、镇和居委会的社区组织为依托,具有社会福利性的居民服务业。社区服务业作为社会化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行业,其组成单位是社区福利服务业、职工社会保险服务业以及社区便民利民服务业。其四大特点分别是福利性、群众性、区域性、服务性。(王青山、刘继同,2004)

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社区建设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经济转型给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社区建设”的目标是要减少国家干预,逐步实现社区自治的治理结构。这被一些学者称为“社区制”,即是一种继“街居制”后,正在逐步形成的社区治理结构。(孙

莹,2006)

1991年中,民政部在社区服务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城市基层积极展开社区建设的工作。由此,中国的社区发展建设实践和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民政部于1999年开展了“全国城市社区建设实验区”的试点工作,先后分两批在全国19个省(区、市)选定26个城区作为城市社区建设实验区,约占全国城区总数的3.3%。进入21世纪,全国的社区建设迈向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9月在吉林省四平市召开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现场会,命名河北省保定市等27个市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市”,北京市西城区等148个区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区”。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已由实验阶段迈向一个全面推进的阶段(刘君德、靳润成、张俊芳,2004)。

应该看到,社区建设之所以得以开展,其背景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以及“单位制社会”的解体。鉴于社区建设是基层社会的整合方式,它的设计应该考虑另一种可能性,即让社区内由兴趣共同、目标相近的居民组成的群体更加广泛、深入、全面地分享公共资源,只有这样,基层整合才能从“政府的事”真正变成居民自己的事(黎熙元、陈福平,2008)。总之,当务之急是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社分开”,把社会事务的权力真正下放给社区,让社区实现自治。并探索如何吸取乡村建设运动、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这些中国独有的社区工作经验,然后从中提炼出有针对性的符合我国特有国情的社区工作实务模式。只有这样,真正符合本土情况的社区工作实务模式才不至于全盘照搬西方的社区工作模式。

三、实践:本土化社区工作教学实践尝试

把“社区工作”引入到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是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在具备实用性的同时,对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技能和专业素养有着相对严格的要求,这一情况迫切要求我们改革“社区工作”课程的教学方法,从而培养出“能上得去、能下得来”,有较高专业水平的实用型人才。笔者认为,对“社区工作”教学改革的一个探索性尝试就是社区体验式教学法。笔者根据在社区工作课程方面的教学经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社区体验式教学法:

(一)确定社区体验对象

结合学校所处地理位置情况以及学生的意愿,根据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内在要求,结合中国城市化迅速发展过程中产生出一系列突出的社会问题等现实背景,把所在班级的学生按照每6人1组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把“社区工作”的实践对象设定为学校附近的社区,且每个小组不能选取相同社区。然后利用专业实践的时间开展社区调查分析、进行社区活动策划实施、提出社区发展建议和总结社区实践,完成学习任务。

(二)开展社区调查分析

开展社区实践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社区调查与分析,它是进行社区活动策划与执行的基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小组在两到三周内,通过对社区进行至少1次的试调查以及3~4次的正式调查,收集社区的相关资料,包括:社区的基本情况、社区内的自然资源与社会、社区内存在的主要问题、社区评估。其中社区的基本情况包括社区的外部环境、地理位置、常住人口数量、年龄和性别结构、居民文化水平、生活水平、生活方式、职业构成等。在深入社区走访调查、获取真实可信的社区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社区调查分析报告。

(三)社区活动策划实施

各小组根据社区调查分析报告,从已掌握的社区基本情况出发。商讨并策划一个适合目标社区的活动方案,撰写一份详细的、有特定目标的社区活动策划书,并依据策划书内容到社区里开展服务。

(四)提出社区发展建议

社区发展建议的提出是小组成员针对目标社区的典型问题,向社区主管部门提出有利于问题解决、实现该社区和谐发展的专业性建议。而社区发展计划则是小组成员作为社区工作参与者之一,以计划制定者的身份介入并参与到社区发展过程中。且两者都有一致的目标,就是解决社区的突出问题,促进社区有序地和谐发展。

(五)社区实践总结

完成以上社区工作实践后,每个小组根据各自的调查结果和实践情况,进行社区实践总结。由教师组织和引导各小组开展社区活动总结讨论与成果分享,由各小组的发言代表介绍所属小组在社区实践过程中的体验和经历,并为今后开展此类活动提供丰富详实的经验借鉴。

现实证明,社区体验式教学法的运用在“社区工作”课程的深入开展和知识传递上具有显著效果。在提高学生的社区工作实务能力的同时,社区居民也深切表示他们的社区凝聚力因此而得到了增强,社区中的许多现实问题也得到解决或找到了解决的良好途径(罗彩娟,2009)。

总之,社区工作是相对比较适应中国大陆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社会工作实务方法。作为社区工作方法和教育的平台,社区工作的课堂教学与实践研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社区工作实务的模式应该结合中国本土有关社区、社区建设等内涵来进行探索,在实务过程中总结和吸取乡村建设运动、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等中国独有的有关社区工作的宝贵经验,从而提炼概括出符合中国本土情况的社区工作实务模式,这样才不至于一味照搬西方的社区工作实务模式。如此一来,我们实现社区工作教学与实务模式本土化的目标就不远。

[参考文献]

- [1]房列曙,陈恩虎,柴文杰,2005,《社区工作》,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2]黎熙元,陈福平,2008,《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新华文摘》第14期。
- [3]李宝库,2001,《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建设》,《社区》第1期。
- [4]李友梅,2005,《费孝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 [5]刘君德,靳润成,张俊芳,2004,《中国社区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
- [6]刘梦,2007,《社区工作》,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 [7]罗彩娟,2009,《社区体验式教学法在“社区工作”课程中的应用研究》,《广西教育学院学报》第3期。
- [8]孙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及其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载殷妙仲、高鉴国,2006,《社区社会工作:中外视野中的交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9]王青山,刘继同,2004,《中国社区建设模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0]夏建中,2009,《社区工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1]徐永祥,2004,《社区工作》,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12]徐震,2007,《徐震教授论社区工作》台北:松慧出版社。
- [13]张敦福,2011,《现代社会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14]钟利民,2010,《社区工作》,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编辑/汪鸿波